



一份执著，一份眷恋；一种信念，一种姿态

幸存者言



Thirty Years

復旦大學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钱理群◎著



Thirty Years

幸存者言

钱理群◎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存者言/钱理群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
ISBN 978-7-309-07788-9

I. 幸… II. 钱…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6981 号

幸存者言

钱理群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孙 晶 胡春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36 千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788-9/C · 181

定价: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我一再追问自己：为谁写作？为何写作？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自白：我是有了曲折的经历，与我们国家和人民一起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以后，才投身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自从事学术研究那一天起，我就把自己研究的目的、任务，归结为“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于是就将自己的写作命名为“幸存者言”。所谓“幸存者”有两个意思：其一，在我所经历的历次政治运动和历史事件中，许多远比我优秀的人都牺牲了，而我还活着；其二，在当下的中国，还有许多优秀的人才，他们仍在追求、思考，甚至写作，但却没有话语权，是我说的“民间思想者”。而阴差阳错，我成了学者，多少有了点发出声音的条件。作为这样的幸存者，对于那些被毁灭的生命，对于沉默的大多数，就多多少少有了点义务和责任。他们存在于我的生命之中：无声地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激励我，又要求我、监督我，当我提起笔时，无法不听从这些无声的命令：我是为他们写作的。

这样，我的研究与写作，就具有了两个自觉追求、特点与意义，也是我最为珍惜的。

首先，追求自我生命与学术的一体性。学术的探讨，也是生命的挣扎；对研究对象的发现，同时是对自我的发现；对研究对象的审视和解剖，更是对自我的质疑和反省；随着学术上的不断开拓，自我生命也得到不断的升华。我喜欢在每部学术著作的后面，都附一个长长的《后记》，讲述写作背后“我的故事”，与著作中所讲的“他人的故事”一起，构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将这样的后记称为“墓志铭”。这并非戏言，我每写完一本书，确实有鲁迅那样的感受：“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编辑成书，不过是将“陈迹收存起来”，“掘坑”造“坟”而已。从积极意义上说，这样的一篇文章，一本著作，就构成了一个又一个人的人生脚印，划出了一道在挣扎

中前行的生命轨迹。

其次,我追求学术研究与我们的时代和脚下的土地的血肉联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这样给自己定位:“自觉地站在边缘位置,用自己的方式,言说时代的中心话题。”对“时代中心话题”,也即社会、人生、政治、国家、民族、世界、人类的大事和大问题的兴趣、关注、思考、参与,已经成为我们这样的成长于革命年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个近乎本能的习惯。而所谓“边缘位置”,是强调“民间立场”、“距离”和“超越”。强调“自己的方式”,则是竭力要保持自身思考和言说的独立性。为实现写作与时代、土地的血肉联系,我采取了两种言说方式。一是学术著作,我的所有的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都产生于时代所提出的重大课题,但我的思考与研究,却是专业的、学理的、有距离的,更带根本性的,我最为迷恋与着力的是时代命题背后与深处的人性、人的存在、人的精神、知识分子的选择的困境等人文问题。我同时以极大的激情书写思想与学术随笔和时事政治评论,直接对现实发言,基本上集中在我所熟悉的学术、教育和政治三大领域。我对自己的要求有三:一是尽可能地说真话,诉真情,揭示真相;二是努力作深度的思考,以史家的眼光、胸襟写当下事;三是把自己放进去,在批判现实时,总要追问自己的责任,审视现实更是审视自己。

这样的写作是具有极大的自我反观性的。我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与写作:“在这几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大转型中,我一直紧张地审视、拷问着自己,并通过学术研究寻找自己安身立命之地。”我希望通过这样的写作获得“学术”、“自我生命”和“时代精神”三者的统一,不但留下个人的生命印记,也能从一个侧面,为所生活的时代与国家、民族发展的历史写下自己的记录,尽到“时代书记员”的责任。

当然,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主观的自觉追求,但其实现的情况却远不如意。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了时代造成的我自己和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精神境界的缺陷,这就使得这样的追求与实现的矛盾,显得特别突出,并令自己特别无奈和沮丧。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任何学术研究都只具有“有缺憾的价值”:价值的另一面,就是一种缺憾;有特色也就同时有局限。我深知前述两大追求,自有其价值,因而产生有限的自信、自尊、自重;但更知其同时存在的负面,以及可能落入的陷阱,因而始终保持清醒与自我警戒。正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我所有

的努力,都带有一种挣扎的意味。在这篇短序里,我已经三次用“挣扎”这一词,这是我最深切的人生感受和体验。但或许也可以因此而自慰:我们努力了、挣扎了,毕竟没有屈服、没有苟且,这就够了。

2010年10月30日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

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8 月出版

- | | |
|---------------|---------------|
| 陈家琪：《愿作如是观》 | 陈思和：《脚步集》 |
| 葛剑雄：《后而立集》 | 葛兆光：《看澜集》 |
| 何光沪：《三十功名尘与土》 | 何怀宏：《旁观集》 |
| 李 辉：《纸上苍凉》 | 林贤治：《沉思与反抗》 |
| 钱乘旦：《寻找他山的历史》 | 孙 郁：《新旧之变》 |
| 萧功秦：《反思的年代》 | 许纪霖：《另一种理想主义》 |
| 徐友渔：《与时代同行》 | 余中先：《左岸的巴黎》 |
| 止 庵：《河东辑》 | 周振鹤：《长水声闻》 |

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1 月出版

- | | |
|-------------------|-------------------|
| 陈嘉映：《白鸥三十载》 | 陈建华：《雕笼与火鸟》 |
| 陈平原：《压在纸背的心情》 | 陈尚君：《敬畏传统》 |
| 黄子平：《远去的文学时代》 | 江晓原：《随缘集》 |
| 雷 颐：《精神的年轮》 | 李公明：《在风中流亡的诗与思想史》 |
| 李庆西：《话语之径》 | 钱理群：《幸存者言》 |
| 钱满素：《文明就是讲道理》 | 王晓明：《近视者辨路》 |
| 吴晓明：《学思集》 | 夏晓虹：《燕园学文录》 |
| 俞吾金：《生活与思考》 | 张隆溪：《一轂集》 |
| 张汝伦：《含章集》 | 赵 园：《昔我往矣》 |
| 郑也夫：《沙葬》 | 周国平：《人间学术》 |
| 朱学勤：《我的“年轮”，我的……》 | 朱正琳：《痕迹》 |

目 录

自序 / 1

一九八三

悼“第一个倒下者” / 1

一九八五

我与鲁迅——《心灵的探寻》后记 / 4

一九八八

我的那间小屋 / 17

一九八九

有缺憾的价值——关于我的周作人研究 / 20

由历史引出的隐忧 / 28

一九九〇

从麻木中挤出的回忆——王瑶师逝世一周年祭 / 32

一九九一

生命的郁热与沉静——《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后记 / 41

一九九二

反省堂吉诃德气与哈姆雷特气——《丰富的痛苦》后记 / 45

一九九三

永远压在心上的坟 / 52

一九九四

中国知识者“想”、“说”、“写”的困惑——读鲁迅作品札记之一 / 55

一九九五

世纪之交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反思 / 66

一九九六

我怎样想与写这本书? ——《1948: 天地玄黄》代后记 / 75

一九九七

我也想骂人——读《恩怨录》 / 81

民间思想的坚守——篮子《山崖上的守望》序 / 83

一九九八

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读《北京大学日刊》有感 / 90

“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 / 97

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笔谈 / 102

一九九九

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重读《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 / 107

二〇〇〇

我在做这些事——2000年总结 / 116

二〇〇一

《与鲁迅相遇》后记 / 127

二〇〇二

我的告别词——在北大最后一次讲课 / 132

二〇〇三

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贵州读本》编后 / 141

二〇〇四

把鲁迅精神扎根在孩子心上——2004年5月21日在上海建平中学的报告 / 145

他们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心声——关于打工子弟教育的两次演讲 / 162

二〇〇五

我与摄影：我的一种存在与言说方式 / 170

《我的精神自传》(大陆版)后记 / 172

《我的精神自传》(台湾版)后记 / 176

二〇〇六

《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后记 / 178

二〇〇七

我为什么“屡战屡挫,屡挫屡战”——在《呼唤教育家精神座谈会》
上的讲话 / 184

二〇〇八

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震灾中对志愿者的演讲 / 190

二〇〇九

课后感言——2009年11月26日在台湾交通大学的最后一堂课 / 207

二〇一〇

呼吁学术自省意识——在《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出版
座谈会上的讲话(摘选) / 213

附录一：给自己的七个命名 / 219

附录二：三十年走过的路 / 226

一九八三

纪事

这是我的自述：“一生裁为四截。前二十一年，算是入世前的准备：1939年出生重庆，在南京读小学、中学，在北京大学亲历反‘右’运动；中间十八年，在边远地区贵州安顺小城中等专业学校教书，在社会底层经历了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1978年重返北京，与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同代友人一起，风风雨雨二十四个春秋；2002年后退休，又回归中学与贵州”。

1982年，回北京已经四年，并于1981年研究生毕业，留校担任王瑶先生的助手。但一入学，王瑶先生就教导说，要沉住气，北大的传统是“后发制人”，没有准备好，就不要乱发文章。因此，直到1982年还没有发表一篇有分量的文章。掩饰不住内心的焦虑，就有了这篇没有发表、也无处发表的“悼文”。其中谈到“历史要求我们为上一代画句号，又为下一代作引号”，就已经隐含了我一生的定位：“历史的中间物”。

悼“第一个倒下者”

多少次了：摊开纸，想为纪念全宇^①写些什么，却一个字也写不出。

一个字写不出，却想得很多，很多。

不只想到全宇，更想到我自己，想到我们的同时代人。

是的，我和全宇，正是同时代人——50年代初期金色的童年编织理想的梦的热情，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火红的时代里信仰主义的虔诚，70年代动乱年头重新思索一切的彷徨、痛苦，80年代历史新时期泥泞中创业的艰难……我们都是共同体验过的。

时代先赋予我们热情、天真的理想主义的气质，接着又教我们懂得世故、现实。

一次次的磨难，使我们变得似乎坚强，而我们内心却十分软弱；我们愤世嫉

俗,又忍辱负重。

历史的使命感使我们强烈地要求为事业献身,无情的现实却使我们不得不瞻前顾后。

我们的心向着未来,羡慕着青年人的勇敢;行动却往往为古老的鬼魂所牵绊。

历史要求我们为上一代画句号,又为下一代作引号;在许多人心目中,我们却是无出息的一代。

夹在老年与青年、历史与未来、理想与现实……中间,我们身心憔悴;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几十年苦斗中练就的内在的坚韧力量……

然而,再坚韧的弓弦也会绷断——全宇生命的断裂就是一个信号。

因此,当全宇夫人告诉我,全宇临终前一再呼喊“我的书,我的书还没有出呀”时,我的灵魂受到了震动。

我觉得,全宇生命的断裂以及他的呼喊,都是带着历史的悲壮性的。

这是历史的一页——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我想起了在青少年时代曾经引导我们走向人生的一本书:伏契克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

全宇,你能够这样说么?

写于1983年8月

〔补记〕

这篇写于十年前的悼文却未能发表——文章原是为朋友们拟编的纪念文集而写的,随着计划的流产,这篇短文也就埋葬在文稿堆里了。

但它始终压在我的心上,使我不得安宁。全宇当年没有立坟,如今自然也见不到坟草青青;但这深藏着的纪念却无论如何应该出土了。

重读之后,依然写不出一个字。

眼前却晃动着鲁迅笔下的“死火”——

全宇是我们这批“文革”后首届研究生中第一个倒下者,他怀着未及燃烧即被冻灭的遗恨而死不瞑目;而我们呢,尽管一次又一次地燃烧了,留下了一本本“骨灰”,但等待着我们的,不依然是烧完么?

但我们仍如鲁迅另一篇散文诗《秋夜》中的小青虫，向着那灯上的“火”撞去，倒下，再撞去……

这就是历史？这乃是宿命？——想不明白，说不清楚。

1993年11月20日急就

未发表，文收《世纪末的沉思》，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

① 全字，即张全字，师从吴组湘先生，攻读古代小说研究，是我们同届研究生，惜英年早逝。

一九八五

纪事

直到这一年，我才真正准备好了，开始在学术界、思想界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这已经是1978年攻读研究生学位七年以后。如果加上1960年大学毕业在贵州苦读的十八年，足足准备了二十五年。

这一年春，我和友人黄子平、陈平原一起，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这一年连续两个学期，我在北大第一次独立开课，讲授《我之鲁迅观》，并在讲稿基础上整理出《心灵的探寻》一书：“它是我对鲁迅的第一个独立发现，我也第一次发现了我自己”，“这是我的《狂人日记》”（《再版后记》）。

《后记》写于1986年初。日本研究鲁迅的前辈丸山升先生当时就指出，我写《心灵的探寻》一书，主要用意都集中在这篇《后记》里，他是对的：我其实正是要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来清理我和青少年时代两个精神之父——鲁迅与毛泽东的关系。其中要竭力摆脱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在心灵上的阴影的欲望是极其强烈的，这也是8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心理。

《心灵的探寻》对我的学术意义也是重大的。它确定了我的学术与文化使命：“做沟通鲁迅与当代中国青年心灵的桥梁。”它所试验的“典型现象”、“单位观念、意象”的研究法，也成为我以后始终坚持的基本研究方法。

我与鲁迅

——《心灵的探寻》后记

一

这里，要谈的是我自己。更确切地说，是“我与鲁迅”。这本是“我之鲁迅观”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我”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同样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总和，透过

“我与鲁迅”，可以从一个特定侧面，看到中国的成长于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他们与 20 世纪中国变革的先驱者鲁迅的认同与辨异，理解与误解，感应与隔膜……

就从 50 年代谈起。

少年时代的我，自然没有自己独立的鲁迅观，但奇妙的是，我对鲁迅的认识竟然受到了一首诗与一个诗题的影响。这首诗是臧克家的《有的人》，我至今还能背得——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上的火烧。
……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
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
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

“一个诗题”——真的，只剩下诗题，诗的内容早已毫无印象了——是郭沫若的《鲁迅笑了》。

现在回想起来，“鲁迅笑了”，正是应和着 50 年代的时代与个人的欢乐情绪；鲁迅在我们这一代心目中，第一个印象不是“横眉冷对”，而是“笑”，这是很有意思的。——不是么？

而臧克家的《有的人》则引起了一个纯真的少年对不朽的生命的无尽遐想与朦胧追求。这时鲁迅离自己是比较遥远的。

认真地读鲁迅的书，是在大学读书期间。今天的大学生已经很难理解，当年

的大学生拼命读书是要被认为走“白专道路”而受到严厉批判的。而我偏偏是个不可救药的读书癖，一面接受批判，不无虔诚地检讨自己，一面却忍不住要悄悄读书。记得1959年有一段时间，空气有点松动，甚至号召“认真读书”，于是，我就趁机公开、半公开地啃起出版不久的《鲁迅全集》来。啃得非常吃力，因为我当时几乎毫无人生阅历，知识又极端贫乏，连字面的意思都弄不懂；但毕竟通读了一遍，而且不知不觉间，微笑的鲁迅变成了眉头紧皱的鲁迅：这大概与我自己的心境变化有关罢。

真正开始研究鲁迅，是在60年代初，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转折：大学毕业以后，由北京发配到了贵州一个偏僻、落后的小城，又面临着那个饥饿的年代。物质的饥饿，特别是精神的饥饿，使我又捧起了鲁迅的书。1962年第一个早晨，我空着肚子，在一间又小又冷的屋子里，拿起笔，开始写我的《鲁迅研究札记》。我的第一个研究题目是：《鲁迅与毛泽东》，以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相通；这大概是受了冯雪峰的影响，因为我的最有力的论据就是冯雪峰《回忆鲁迅》里的几段话。我在文章开头引用了叶剑英的诗句：“东方风格千秋在，举世嚣嚣亦枉然”，把鲁迅与毛泽东同样看作是“东方风格”即“为无产阶级思想所照耀的我们民族性格”的伟大代表，并且把这种“东方风格”、“民族性格”概括为“硬骨头精神与韧性精神的结合”——这是我的第一个鲁迅观；它直接地反映了60年代初由于苏联对中国的封锁而激发起来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先后经历了两次外来的封锁——5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封锁，60年代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封锁，这对于恰恰在这二十年内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对这一影响，人们至今仍然估计不足。正是在这两次封锁中，毛泽东高举起了维护民族独立、统一与尊严的大旗，因而为这一代知识分子所普遍接受，并逐渐成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与导师。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在第一篇论文里，引述了毛泽东50年代所写的《别了，司徒雷登》里的一段话：“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么？”我当时是一边写一边流泪的；因为这时候我们又面临着苏联的封锁。这一代知识分子因此而自愿地接受了毛泽东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理论，以及他的大跃进政策和反修防修的思想。尽管大跃进给包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内的全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人们仍然认

为,它是以一种曲扭的形式反映了处于封锁下的中国人民迫切要求迅速改变自己国家一穷二白面貌,从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中解脱出来的民族情绪与愿望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民族情绪与社会心理下,鲁迅“没有丝毫奴颜与媚骨”的“硬骨头”精神,在这一代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影响,鲁迅本人也与毛泽东一样,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我自己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下,选择了鲁迅与毛泽东作为精神的支柱。这一选择,对我的实际意义是,尽管处在个人生活的逆境——由文化中心北京发放到文化沙漠贵州——中,却始终保持了发奋图强、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我按照毛泽东的教导,自觉地把我的本职工作——在一所小小的中等专业学校作语文教员——与整个国家、民族的振兴事业联系在一起,劲头十足地、兢兢业业地教育着学生,同时,几乎是废寝忘食地读书,研究鲁迅,一遍又一遍地通读《鲁迅全集》,写下了大量笔记,为我今天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而我这样的精神状态,在我的同代人中是有代表性的。

但这同时也存在着可悲的误解与曲解,出现了可怕的历史倒退。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于毛泽东的英雄、领袖地位的确认,对于他的许多理论的接受,开始确实是一种理智的选择——由于他代表了民族的利益,由于他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成功。但在发展过程中,却逐渐变成了盲从。人们开始是出于信任,以后则出于盲目的惯性作用,逐渐接受了这样的理论与事实:探索中国发展道路这类大事是毛泽东这样的领袖的特权,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只需要按毛泽东的指示行事,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就这样作出了关键性的错误选择:他们半是被迫、半是自动地放弃了探索真理的权利,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这不仅从根本上背离了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历史品格的丧失:在社会分工中,以思考作为本职的知识分子居然停止了思考,甘心作驯服工具,这真是历史的大倒退、大悲剧,也是历史的大嘲讽。但我们却长期以来对此麻木不仁,安之若素,甚至沾沾自喜。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当我重读到鲁迅这段话:“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①回想起我也曾长时间地陶醉于自己的驯服中,我觉得鲁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灵魂,我无地自容!